

# 時代變遷 野百合安靜了

■何明修

上個月在野百合學生運動步入二十周年之際，南部的校園發生了三起學生抗爭事件，包括高師大的抗議宿舍門禁、台南女中的要求衣著自主權及中山大學的反對校方強制推行無肉日。乍看之下，台灣的學生似乎不再心繫國家大事，而只關切瑣碎的生活議題；救國濟世的理想主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取自身權益的利己主義。三月學運悄然地度過了二十歲生日，在校園裡與媒體上激不起一絲漣漪，似乎一點也不足為奇了。這樣道德的指控其實是不公允的，它忽略了晚近以來台灣社會種種的鉅大變遷。

首先，在野百合時代，多數大學生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畢業後只有二十二K的夢魘。聯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子女獲得教育機會，但是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們唸起大學來備加艱辛。在嚴峻的生存壓力下，大學生的關切自然會有所轉向。

其次，現在的大學生也不再揹負起社會良心的角色，無論這樣的期待是來自於社會公眾，亦或是他們所自我加諸的。愈是處於不合理的體制，學生的社會任務

往往就愈具有神聖性。國賊與強權雙重壓迫激發出五四學生運動；同樣地，如果沒有殖民地的歧視，蔣渭水所帶領醫學院學生就不會投入民族運動。

廿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也是相似情境下的產物。在當時，受夠了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鬥爭的社會大眾，在學生們身上看到了一股清流，苦悶而無處發洩的輿論因而找到了心理投射的對象。事實上，當初滿腔熱情的學生也是跌跌撞撞地扮演起公眾

所期待的角色。在中正廟廣場上，那條區隔學生與市民的糾察線即具有這樣的曖昧性，學運的「純潔性」一方面是帶有階級區分的意味，排除工農大眾的參與，另一方面也是被保護的對象，避免情治單位的滲透與瓦解。

誠如社會學家Giddens所指出的，解放政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生活政治。在以往，我們期待普遍階級的出現，無論是

勞工、第三世界農民、或是六〇年代新左派學生。這些革命主體被認為能徹底改變社會的不公義，使政經資源重新分配。但是在晚近，一方面極端的階級與種族壓迫已經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威脅個人自由的新科技、環境汙染、性別歧視、官僚獨斷越來越難以被忍受，因此捍衛生活風格的自主性與多元性成為當前進步性運動的主軸。從這個角度來看，學運的生活化與日常化也就理所當然的。

在揚棄了被施加的魔咒之後，學生就不再被迫要扮演他們勉強不來的角色。做為校園生活的成員、年輕的公民、未來的生產者、社區的居民，他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實踐自己青春理想的管道。不需全國性媒體注意，而又能遍地開花的學生運動，或許是一種安安靜靜地紀念野百合最好的方式。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